

鄱阳湖区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的效果评价优先序及影响因素研究^{*1}

刘小春¹ 赵丹²

(1.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 330045;

2.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利用江西省鄱阳湖区 11 个县（区）的 1009 份农民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多元 Logistic 选择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依次为“广播、电视”、“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等三种。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距离乡镇政府远近、经济发展程度、村人均纯收入、纯农业户数、年龄、收入主要来源、家庭收入水平及对村干部的信赖等 9 个因素至少对三种最有效的宣传方式中一个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进行湿地保护政策宣传时应高度重视这三种宣传方式，并结合“互联网+”时代的微博、微信等媒体进行宣传，以便提高湿地保护理念、政策、方针及手段的宣传效果。

【关键词】：农户；湿地保护；优先次序；多元 Logistic 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7）03—0064—10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被人类誉为“地球之肾”、“自然物种基因库”、“生命摇篮”的湿地，与海洋、森林共同称为全球三大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调节气候变化，调蓄突发洪水，净化污染水质，涵养地表水源，绿化自然环境及控制土壤遭受侵蚀等多种生态保护功能，有着极大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然而，据国家林业局 2014 年 1 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2009—2013 年）显示：“相比于第一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近十年来湿地面积总体减少 339.63 万公顷，其中全国自然湿地面积减少 337.62 万公顷，减少比率达 9.33%。”同时减少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湿地生物多样性，动植物种类，尤其是世界濒危物种衰退趋势明显。大量内陆湿地丧失导致淡水储蓄量减少，加剧了水资源危机。过度开发滨海湿地，使其面积严重萎缩。因此，保护湿地显得极其重要、紧迫。

针对生态湿地保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于 2006 年正式启动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2—2030 年）》及其具体实

¹ 收稿日期：2016- 08- 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鄱阳湖区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绩效及其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农户视角”（41261106）

作者简介：刘小春，江西农业大学副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就业和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通讯作者联系方式 myson1009@163.com；赵丹，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南昌日报社主任记者，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

施方案，2004 年下发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提出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而湿地保护最直接、最关键的主体应属湿地区域内以湿地为生存根基，依靠湿地掘取生活来源的农民。应该说，湿地保护与湿地区域内农民的生产、生活是一对现实矛盾，对湿地实行绝对保护，必将影响其生产、生活方式。如何解决这一现实矛盾，使湿地保护意识深入农民之心，使参与湿地保护成为农民的自觉响应行为，对农民，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湿地保护法规和政策宣传至关重要。在诸多宣传方式中，何种宣传方式最有效，其效果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急需研究。

关于湿地保护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宏观层面，学者们对各国进行湿地保护的重要性及各国湿地保护政策进行了研究。如张春丽等（2008）认为退耕还草、退耕还湿及设施建设工程等对促进湿地良性发展意义重大，为了保护湿地大力鼓励这些行动。^[1]卢松等（2003）则提出了湿地资源及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建议。^[2]周婧婧等（2014）对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湿地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3]刘子玥等（2015）以松花江流域为例研究了湿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4]微观层面，一方面学者们对湿地区域内农民湿地保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少研究，如 Cheikhna 等（2010）实证研究了农民进行湿地恢复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土地利用方式，农民对湿地恢复的态度，农民的风险偏好及财富水平是其重要影响因素。^[5]Ambastha 等（2007）采用条件价值法对印度 Kabartal 湿地保护区周边农民展开了大量调查，分析了农民对湿地保护的支持意愿。^[6]李晖等（2002）采用案例剖析法对洞庭湖区域农村工业发展与移民建镇的关系进行了案例分析。^[7]王昌海等（2015）通过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城乡居民对湿地保护的认知情况，结果发现居民对湿地保护的认知程度都较低。^[8]另一方面，学者们就农民选择某一湿地保护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田还湖、退耕还湿及移民建镇等）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如闵骞等（2009）对鄱阳湖区农民移民建镇、退田还湖的意愿及其实施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开展了较全面的调查与分析。^[9]康兰媛和朱红根（2015）运用 Logistic 模型考察了鄱阳湖区域内农民参与通过移民建镇保护湿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对村干部的信任、对湿地功能的认知情况等对农民的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10]朱红根和江慧珍（2015）运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实证分析了补偿权益保障、村干部特征对农民退耕还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权益保障显著促进农民退耕还湿。^[11]熊凯等（2016）基于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有序 Logistic 模型，对鄱阳湖湿地地区农民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民的受教育年数、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人口数、是否重视对湿地环境的改善、家庭居住位置、承包水域面积和耕地面积与农民受偿意愿呈显著相关性。^[12]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宏观层面主要集中于定性、规范分析湿地保护的重要意义，湿地保护政策支持设计等。微观层面主要集中于运用调查数据及典型案例实证分析农民湿地保护的认知及行为意愿并且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农民对于运用退耕还湿等方式保护湿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and 理论借鉴。但是已有研究中，专门以湿地保护宣传方式为对象的研究还没有，而根据课题组对农民的实地调查访谈及现实情况显示，选择合适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不仅可以促使宣传更有针对性，还有利于湿地保护宣传效果的提升。

二、模型构建、变量选择说明及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主要从接受者农民角度考察农民评价效果最好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并考察哪些因素在影响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的优先秩序。因此，以农民选择排序第一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作为因变量。具体因变量的赋值为下述情况，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文章将除广播（电视）、送戏下乡、宣传专栏三者之外的其他第一选择的宣传方式合并为“其他（包括报纸、手机短信、宣传横幅、挂历画册及网络等五种）”方式并将其作为分析参照组，定义为 Y=4；第一选择“广播、电视”宣传方式定义为 Y=1；第一选择“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定义为 Y=2；第一选择“宣传专栏”宣传方式的定义为 Y=3。根据社会科学领域中已有研究成果，当因变量为离散型变量，类别在三类及以上，且每一类别之间不存在排列序次关系时，可以采用多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王济川和郭志刚，2001）。^[13]就文章中农民对现有湿地保护各种宣传方式优先次序选择的四种首选宣传方式，可以将多元 Logistic 模型表述为如下数学表达式：

$$\ln \frac{p(Z_1)}{p(Z_4)} = \alpha_1 + \sum_{k=1}^k \beta_{1k} X_k + \varepsilon \quad (1)$$

$$\ln \frac{p(Z_2)}{p(Z_4)} = \alpha_2 + \sum_{k=1}^k \beta_{2k} X_k + \varepsilon \quad (2)$$

$$\ln \frac{p(Z_3)}{p(Z_4)} = \alpha_3 + \sum_{k=1}^k \beta_{3k} X_k + \varepsilon \quad (3)$$

并有 $Z_1 + Z_2 + Z_3 = 1$

式（1）、式（2）及式（3）中， p 为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优先选择的概率， Z_1 为广播、电视湿地保护宣传方式， Z_2 为送戏下乡湿地保护宣传方式， Z_3 为宣传专栏湿地保护宣传方式， Z_4 为其他湿地保护宣传方式（也是计量分析选择的参照组）， α_n ($n=1, 2, 3$) 为表达式常数项， β_{nk} ($n=1, 2, 3$) 为第 k 个选择优先次序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x_i 为自变量，也即影响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的主要因素（如表 1 所示）， ε 为随机误差项。同时 α_n 和 β_{nk} 的值可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

（二）变量选择说明

根据前文的相关研究综述及相关选择行为理论，本文在构建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影响因素计量经济模型时，选择农民所在村区域发展特征、被调查农民的个体特征、农民的生产经营特征、农民湿地保护政策认知特征总共 4 类 14 个变量。

表 1 计量模型变量选择与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评价最优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 (Y)	1= 广播、电视；2= 送戏下乡；3= 宣传专栏；4= 其他	1	4	1.62	1.057
自变量					
1. 农民所处村域特征					
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内 (X_1)	农民所在村是否处于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区域内：1= 是；2= 否	1	2	1.59	0.492
所处村距乡镇政府远近 (X_2)	所处样本村距乡、镇政府实际距离 (公里)	1	28	6.79	5.975
所处村经济发展程度 (X_3)	1= 上等；2= 中上等；3= 中等；4= 中下等；5= 下等	1	5	3.08	1.009
所处村人均纯收入 (X_4)	所处样本村全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元)	3180.00	9000.00	5928.94	1598.23
所处村纯农业户数 (X_5)	所处样本村全村总户数中纯农业户数量 (户)	17	107	58.45	24.644
2. 农民的个体特征					
农民年龄 (X_6)	样本农民的实际年龄 (岁)	16	88	44.90	11.788

续表 1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民性别(χ_7)	1= 男; 2= 女	1	2	1.25	0.432
农民婚姻状况(χ_8)	1= 未婚; 2= 已婚	1	2	1.07	0.261
农民文化程度(χ_9)	1= 文盲;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 5= 大专及以上	1	5	2.71	1.238
农民参加培训情况(χ_{10})	1= 参加农业技术培训; 2= 参加非农技能培训; 3= 两者都有参加; 4= 两者都没有参加	1	4	2.99	1.197
3. 农民的生产经营特征					
农民类型(χ_{11})	1= 农业种植者; 2= 畜牧业者; 3= 水产养殖业者; 4= 天然捕捞渔民; 5= 其他	1	5	2.42	1.737
农民收入主要来源(χ_{12})	1= 粮食种植; 2= 养殖业; 3= 打工收入; 4= 个体经营; 5= 其他行业	1	5	2.26	1.320
农民家庭收入水平(χ_{13})	1= 高于平均水平; 2= 等于平均水平; 3= 低于平均水平	1	3	2.02	0.595
4. 农民湿地保护政策认知特征					
农民对村干部的信赖 (χ_{14})	对“村干部是值得信赖的人”这句话的看法: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一般; 4=同意; 5=非常同意	1	5	3.11	0.908

(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间对江西省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区农民开展的实地问卷调查访谈。课题组一行七人采取简单随机抽样调查访谈方式, 调查访谈了涉及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区内 11 个县, 59 个自然村, 1 200 户样本农民, 共计调查访问问卷 1200 份, 回收整理并有效问卷 1009 份, 问卷有效率达 84.1%, 每一县区调查问卷的数量基本按该县区人口一定比例确定, 每一县区比例大致相同。有效访问问卷数据县区来源分布情况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2 和表 3 所示。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一是农民的个体及家庭特征(包括样本农民年龄、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农民培训情况、农民家庭人口数、房屋类型及家庭收入情况等); 二是农民的生产经营特征(包括主要收入来源、农民类型、总耕地面积及农民收入水平等); 三是农民参与湿地保护意愿及其行为特征(包括接受湿地生态补偿意愿、湿地生态功能了解状况、退田还湿意愿及对湿地保护的态度等); 四是农民未来就业前景特征(包括农民参与移民建镇意愿和农户重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等); 五是农民对湿地生态保护政策的认知特征(包括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情况和对政府保障农民权益的评价等)。此外, 在调查问卷中还设置了对被调查农民所在样本村即所处村区域特征情况的相关调查内容, 具体包括本村距县(区)政府的距离, 本村所处区域, 本村经济发展程度居所在县(区)水平, 所在村经济总收入, 所在村居民人均收入, 所在村农户情况及村总人口情况等内容。

表 2 有效问卷县区分布情况

县名	都昌	湖口	九江	庐山	南昌	彭泽	鄱阳	新建	星子	永修	余干
份数	176	37	10	14	24	129	553	18	10	27	11
比重	17.4%	3.7%	1.0%	1.4%	2.4%	12.8%	54.8%	1.8%	1.0%	2.7%	1.1%

由表 3 可知, 在被调查的 1009 个有效样本农民中, 男性占绝大多数, 其比重达 75.2%。婚姻状况中已婚农民占绝大多数, 其比重达 92.7%。在有效样本的年龄结构中, 青壮年占大多数, 数据显示 31~59 岁的农民共计 760 人, 其比重达 75.3%。农民是户主样本的占绝大多数, 共计 684 人, 其比重达 67.8%。样本文化程度方面, 文盲占比 19.6%, 小学占比 27.0%, 初中占比 24.9%,

高中占比 19.4%，专科及以上占比 9.1%。被调查样本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相对较少，大多数样本从未接受任何技能培训，共计 524 人，占比达 51.9%。

表 3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统计表

变量	变量描述	频数	占比 (%)
性别	男	759	75.2
	女	250	24.8
婚姻状况	已婚	935	92.7
	未婚	74	7.3
年龄 / 岁	30 及以下	119	11.8
	31~44	406	40.2
	45~59	354	35.1
	60 及以上	130	12.9
是否户主	是	684	67.8
	否	325	32.2
文化程度	文盲	198	19.6
	小学	272	27.0
	初中	251	24.9
	高中	196	19.4
	专科及以上	92	9.1
接受培训情况	农业技术培训	191	18.9
	非农技能培训	157	15.6
	两者都有	137	13.6
	两者都没有	524	51.9

三、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

根据课题组的调查访谈数据,针对 1009 个农民样本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选择的优先情况,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并对农民认为最有效的前三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进行排序,由表 4 的数据可知,农户认为最有效的前三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排在第一位的为“广播、电视”方式,共有 703 个样本,占比 69.7%。说明在湿地生态保护区的农村广播,尤其是电视的普及率很高,并且农民对电视媒介宣传方式的接受程度挺高。278 个农民样本(占比 27.6%)将“送戏下乡”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排在第二位,说明“送戏下乡”在保护区农村是农民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并且政府或相关组织“送戏下乡”的频率也较高。在第三位选择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农民认为最有效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是“宣传专栏”,说明湿地保护区农民对设在固定地点的农村政策“宣传专栏”的阅读关注度较高,并且在农村农民对“宣传专栏”宣传政策方针的方式较为适应。

表 4 农民认为最有效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排序

宣传方式	第一位 / 个	百分比 / %	第二位 / 个	百分比 / %	第三位 / 个	百分比 / %
广播、电视	703	69.7	21	2.1	30	3.0
报纸	81	8.0	138	13.7	10	1.0
送戏下乡	105	10.4	278	27.6	77	7.6
手机短信	32	3.2	259	25.7	94	9.3
宣传横幅	8	0.8	174	17.2	228	22.6
宣传专栏	78	7.7	95	9.4	250	24.8
挂历画册	1	0.1	38	3.8	137	13.6
网络	1	0.1	6	0.6	183	18.1
合计	1009	100	1009	100	1009	100

四、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影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次序因素的实证回归结果进行分析,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其他”湿地保护宣传方式为参照方式,根据计量实证结果考察“广播、电视”宣传方式,“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及“宣传专栏”宣传方式在效果评价优先次序选择时有什么样的差别。二是如果这四种宣传方式在效果评价优先次序选择时存在显著差别,那引起这些差别的具体影响因素到底是哪些?这些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怎样?

(一) 总体结果分析

文章运用 SPSS17.0 专业计量统计分析软件对 1009 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处理分析,采用逐步向后回归的方法,最初将有可能对因变量有影响的自变量引入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接着逐步剔除对三个因变量影响都不显著的自变量,直到所有自变量对三个因变量中至少一个具有显著影响为止。在处理过程中,选择最后一个因变量,即“Y= 其他”作为参照组,对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该模型的统计分析值为 156.364, $-2LL = 1.735E3$, Cox 和 Snell $= 0.144$,模型总体显著性 $P < 0.001$,这就充分说明,模型的显著性情况良好,且总体有效样本数据能较好地拟合。从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影响因素多元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可知,选择“其他”宣传方式为参照组,“广播、电视”宣传方式、“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及“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参照差别比较明显。

表 5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误	Wald 值	Sig. 值
Y=1 (广播、电视 / 其它)				
是否在自然保护区(χ_1)	- 1.398***	0.316	19.600	0.000
距乡镇政府远近(χ_2)	- 0.024	0.018	1.879	0.170
经济发展程度 (χ_3)	0.055	0.210	0.068	0.794
人均纯收入(χ_4)	0.047	0.140	0.512	0.474
纯农业户(χ_5)	0.010**	0.005	4.239	0.040
年龄(χ_6)	0.026***	0.009	8.099	0.004
收入主要来源(χ_{12})	- 0.020	0.078	0.064	0.800
家庭收入水平(χ_{13})	0.302*	0.180	2.809	0.094
村干部的信赖 (χ_{14})	- 0.224*	0.119	3.554	0.059
Y=2 (送戏下乡 / 其他)				
是否在自然保护区(χ_1)	- 0.929**	0.406	5.227	0.022
距乡镇政府远近(χ_2)	- 0.031***	0.025	1.600	0.006
经济发展程度 (χ_3)	- 0.179	0.266	0.453	0.501
人均纯收入(χ_4)	0.014	0.028	0.003	0.955
纯农业户(χ_5)	0.004	0.006	0.399	0.528
年龄(χ_6)	0.025**	0.012	4.420	0.036
收入主要来源(χ_{12})	0.033	0.102	0.107	0.744
家庭收入水平(χ_{13})	- 0.060***	0.240	0.062	0.004
对村干部的信赖 (χ_{14})	- 0.293*	0.157	3.472	0.062

Y=3 (宣传专栏/其他)				
是否在自然保护区(X_1)	-0.499	0.533	0.876	0.349
距乡镇政府远近(X_2)	-0.209***	0.049	17.775	0.000
经济发展程度 (X_3)	-0.645**	0.310	4.325	0.038
人均纯收入(X_4)	0.053**	0.047	4.288	0.038
纯农业户(X_5)	0.001	0.008	0.014	0.907
年龄(X_6)	0.015	0.013	1.163	0.281
收入主要来源(X_{12})	-0.456***	0.144	10.001	0.002
家庭收入水平(X_{13})	0.560**	0.280	3.995	0.046
村干部的信赖 (X_{14})	-0.985***	0.184	28.733	0.000

注：*、**、*** 分别代表在 10%、5%及 1%水平上的显著性。因为解释变量较多，在表中只列出了至少对一个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

1. 广播、电视宣传方式参照分析

从表 5 中 Y=1 (广播、电视/其他) 的回归结果可知，相对于“其他”湿地保护宣传方式，9 个影响因素中有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纯农业户数、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对村干部的信赖等 5 个因素的影响结果比较显著。其他的影响因素，如距离乡镇政府远近、村经济发展程度、人均纯收入及收入主要来源等 4 个影响因素的影响都不显著。在 5 个显著性因素中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及年龄两个因素的 Sig 值小于 0.01，纯农业户影响因素的 Sig 值位于 0.01 及 0.05 之间。其他 2 个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的 Sig 值都位于 0.05 及 0.1 之间。

2. 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参照分析

从表 5 中 Y=2 (送戏下乡/其他) 的回归结果可知，相对于“其他”湿地保护宣传方式，9 个影响因素中有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对村干部的信赖等 5 个因素的回归结果较为显著。其他几个影响因素，如农民所在村经济发展程度、人均纯收入、纯农业户数及收入主要来源等 4 个影响因素的影响都不显著。在 5 个显著性因素中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及家庭收入水平两个因素的 Sig 值小于 0.01，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及年龄两因素的 Sig 值在 0.01 及 0.05 之间。对村干部的信赖影响因素的 Sig 值都在 0.05 及 0.1 之间。

3. 宣传专栏宣传方式参照分析

从表 5 中 Y=3 (宣传专栏/其他) 的回归结果可知，相对于“其他”湿地保护宣传方式，9 个影响因素中有距离乡镇政府远近、村经济发展程度、人均纯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家庭收入水平及对村干部的信赖等 6 个因素的影响结果比较显著。其他的影响因素，如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纯农业户数、年龄等 3 个影响因素的影响都不显著。在 6 个显著性因素中距离乡镇政府远近、收入主要来源及村干部的信赖三个因素的 Sig 值小于 0.01，村经济发展程度、人均纯收入及家庭收入水平等三因素的 Sig 值都在 0.01 及 0.05 之间。

(二) 具体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前文研究综述、计量模型变量选择及农户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次序影响因素的多元 Logistic 模型回归检

验结果，分别从农民所在村域特征、农民个体特征、农民的生产经营特征及农民对湿地保护政策的认知特征等四个方面对各因素影响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的强弱情况及正负方向进行具体分析，为今后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提供决策参考。

1. 村区域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并逐个剔除不显著的自变量后，最终确定村区域特征中 5 个影响因素都至少对一种宣传方式效果评价具有显著影响。由表 5 的实证回归结果可知，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内对“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两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有负向影响，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没有影响。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不处于自然保护区的农民比处于自然保护区的农民对“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两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更高，这是因为政府针对非自然保护区农民宣传湿地保护一般不采取特别的手段，仍然是通过在农村普及最广的传媒手段进行一般性的宣传，而对于自然保护区经常会有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宣传。另外“宣传专栏”宣传方式不受这一因素的影响，主要在于这一宣传方式无论是在自然保护区还是在非自然保护区都是一种传统农民效果评价较高的宣传方式。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对“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两种宣传方式有负向影响，对“广播、电视”宣传方式没有影响。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民所在村距乡镇政府越近对“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两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越高，越远效果评价越低。这是因为距离乡镇政府越近，“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两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就实施得越频繁，农民习惯于这两种宣传方式。经济发展程度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有负向影响，对“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两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民所在村经济发展程度越低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效果评价越低。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农民的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可能有不少人看不懂“宣传专栏”内容。纯农业户数的多少对“广播、电视”宣传方式具有正向影响，对“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民所在村纯农业户越多，对“广播、电视”宣传方式效果评价越高。这是因为纯农业户越多其文化程度就相对越低，通过“广播、电视”宣传农户更能理解、接受。

2. 农民生产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的自变量后，最后确定农民生产特征中有 2 个影响因素至少对一种宣传方式效果评价具有显著影响。由表 5 的实证回归结果可知，收入主要来源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有负向影响，对“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两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民收入主要来源越倾向于其他行业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效果评价越低。这是因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越倾向于其他行业，农民在村中逗留的时间就相对越短，就越没有时间去阅读“宣传专栏”的内容，反而更喜欢通过“广播、电视”等宣传方式获得宣传内容。家庭收入水平对“广播、电视”、“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三种宣传方式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广播、电视”及“宣传专栏”宣传方式的影响为正，对“送戏下乡”宣传方式的影响为负。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对“广播、电视”及“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效果评价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对“送戏下乡”宣传方式效果评价越高。这是因为收入水平越高越容易置办电视，电视普及率也越高，相对知识水平也越高，“宣传专栏”也越容易看懂。收入水平越低越期待形式多样的“送戏下乡”宣传方式。

3. 农民个体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的自变量后，最终确定农民个体特征中只有唯一的年龄影响因素至少对一种宣传方式效果评价具有显著影响。其他农民个体特征中的因素如性别、婚姻状况及培训情况等对宣传方式效果评价的影响都不显著。由表 5 的实证回归结果可知，年龄对“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两种宣传方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民年龄越大对“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宣传湿地保护相关政策效果评价越高。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的视力、接受力及思考力等都相对下降，农民对发声传媒手段进行的宣传评价更高。

4. 农民政策认知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 5 的实证回归结果可知,运用逐步回归方法剔除不显著变量后,最终确定在农民政策认知特征中选取的唯一影响因素,即对村干部的信赖对三种宣传方式效果评价都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影响的方向都是负的。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民对村干部越不信赖,其越对通过各种媒体获得对湿地保护宣传的各种政策知识效果评价越高。这是因为如果对村干部信赖的话,湿地保护相关政策就可以更多通过村干部这一渠道进行,如采取村干部挨家挨户宣传或村干部全村大会宣讲等方式进行宣传。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根据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多元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依次为“广播、电视”、“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二是从具体影响因素的影响显著性可知,不同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的影响因素有较大差异。对“广播、电视”湿地保护宣传方式影响显著的有: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纯农业户数、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村干部的信赖等 5 个因素,其中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及年龄两个因素具有重要影响。对“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影响显著的有: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村干部的信赖等 5 个因素。其中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及家庭收入水平两个因素有重要影响。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影响显著的有:距离乡镇政府远近、村经济发展程度、人均纯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家庭收入水平及对村干部的信赖等 6 个因素。其中距离乡镇政府远近、收入主要来源及对村干部的信赖三个因素有重要影响。

(二) 政策建议

1. 由于当前农民评价效果最好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是“广播、电视”、“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等三种,因此政府及相关组织部门在进行湿地保护政策宣传时应高度重视这三种宣传方式,不仅要充分运用好这三种方式,还应进一步想方设法提升这三种方式的效果,可以多制作一些有关湿地保护的公益广告、纪录片,甚至专门开设湿地保护电视栏目在电视上播出,可以将湿地保护内容编排成小品、情景剧及舞台剧等形式通过“送戏下乡”的方式宣传,宣传专栏应经常以头版头条或者专刊的方式进行湿地保护方针、政策宣传,以使湿地保护政策宣传更精准、更高效。

2. 在非自然保护区,如果农民中纯农业户较多,老年人越多,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对村干部越不信赖的村区域,越应重视“广播、电视”宣传方式,经常通过中央电视、广播台及省、市电视、广播台进行湿地保护理念、方式、政策及手段宣传,主要以中央及省级文件的形式进行播报,同时提高广播、电视的普及率以提高湿地保护政策的宣传效果。如果在非自然保护区,距离乡镇政府越近,老年人越多,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农民对村干部越不信赖的村区域,越应重视推广“送戏下乡”宣传方式,政府及各种相关组织应提高“送戏下乡”的频率,可以结合“三下乡”、湿地保护高层论坛、湿地保护主题活动等经常性深入农村进行湿地保护专场演出。在距离乡镇政府越近,经济发展程度越低,人均纯收入越高,收入主要来源越倾向于种养业,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对村干部越不信赖的村区域越应重视“宣传专栏”宣传方式,在这些村区域应充分利用好各地各村“宣传专栏”这块阵地,经常、及时地更换湿地保护最新理念、方针、政策及手段,以便农民及时了解掌握。

3. 根据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描述统计结果显示,除了上述三种最有效的宣传方式,紧随其后的是手机短信及宣传横幅两种宣传方式,农民的效果评价也较高。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应重视完善这两种宣传方式,经常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对湿地保护区农民发出有关湿地保护的各种提示、警示,采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形成标语以宣传横幅的方式在交通要道、村口、农民活动中心等地进行宣传,另外还应运用好当前“互联网+”时代的微博、微信等媒体进行宣传,以便促进宣传方式的多元化,提高湿地保护的宣传效果。

参考文献:

-
- [1]张春丽, 佟连军, 刘继斌. 湿地退耕还湿与替代生计选择的农民响应研究——以三江自然保护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08, (4): 568- 574.
- [2]卢松, 陆林, 凌善金. 湖区农户对湿地资源和环境的感知研究——以安徽省安庆沿江湖群为例[J]. 地球科学, 2003, (6): 762- 768.
- [3]周婧婧, 董宜丽, 马 跃. 生态文明背景下湿地保护问题研究——以淮北市为例[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5): 16- 19.
- [4]刘子玥, 王辉, 霍璐阳. 松花江流域湿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研究[J]. 湿地科学, 2015, (4): 202- 206.
- [5]Cheikhna O. Dedah, Richard F. Kazmierczak, Jr. and Walter R. Keithly, Jr.. Factors Influencing Private Landowner Restoration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Coastal Louisiana[C]. The Souther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Orlando, Florida, February 6- 9, 2010.
- [6]Ambastha K., Hussain S A., Badola R..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 Conserving Wetlands of Indoganggetic Plains: A Case Study of Kabartal Wetland, India[J]. Environmentalist, 2007, (27): 261- 273.
- [7]李晖, 庞效民, 傅晖. 洞庭湖区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社会经济效应[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2, (2): 105- 110.
- [8]王昌海, 温亚利, 李昊一. 北京城乡居民湿地保护认知度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 86- 93.
- [9]闵骞, 傅春, 林永钦. 鄱阳湖区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对经济影响的调查分析[J]. 水利发展研究, 2009, (2): 22- 25.
- [10]康兰媛, 朱红根. 湖区农户湿地保护与移民建镇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鄱阳湖区农户调查问卷[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 55- 60.
- [11]朱红根, 江慧珍. 补偿权益保障、村干部特征对农户退耕还湿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鄱阳湖区的实证[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5, 14(3): 296-301.
- [12]熊 凯, 孔凡斌, 陈胜东. 鄱阳湖湿地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CVM 和排序 Logistic 模型的实证[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6, (1): 28- 35.
- [13]王济川, 郭志刚. Logistic 回归模型: 方法与应用[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